



大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

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穆罕默德·班迪先生.....（尼日利亚）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73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A/74/324）

秘书长的报告（A/74/325和A/74/326）

决议草案（A/74/L.8）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欢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来到大会。

促进正义和国际法一直是大会工作的基础。在高级别会议周期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他们支持建立基于强有力法治的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秩序。《罗马规约》仍然是我们实现国际正义的共同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通过表明了会员国对于结束国际社会关切的最严重罪行不受惩罚现象的承诺。显然，国际刑事法院为履行《罗马规约》规定的任务而开展的活动符合我们大家为维护和平而促进正义和法治的工作。

我们在准备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必须回顾我们在促进法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并致力于克服我们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实现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最佳保障。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审议这个议程项目时，会提醒自己对国际正义与和平的共同承诺。我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将会顺利实现所有这些理想。

现在，我荣幸地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发言。

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法语发言）：我有幸在担任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期间，第二次向大会提交法院年度报告，该报告已经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见A/74/324）。我不会详细谈论报告内容；我会简单概述法院的现状，同时更详细地谈一些专题。

（以英语发言）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必须暂停一下，祝贺蒂贾尼·穆罕默德-班迪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主席。我有幸与他有私交，知道他才能卓著，更突出的是他毫无矫饰的谦逊和非凡的责任感。有他担任主席，大会将得到出色指导。

首先，我谨表示，法院感谢联合国不断向国际刑院提供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即使必要时是以有偿方式提供。正如法院报告详述的那样，这种帮助范围广泛，包括会议服务、交通运输、通信、医疗援助和安全安排等领域的合作。这种帮助，特别是在外地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对国际刑院的工作确实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9-3496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至关重要。因此，我代表国际刑事法院，感谢秘书长和本组织高级管理层提供这种支持和其他各类支持，帮助我们大家努力实现和平、安全、普遍享有人权、发展和尊重国际法的共同目标。

我也要感谢大会之前历任主席尽他们所能给予法院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我目睹了大会前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加尔塞斯女士在其任期内提供的这种支持。并且我已经看到穆罕默德-班迪先生在其任期内即将提供的支持。

(以法语发言)

各国的合作仍然对法院活动同样重要。我们非常感谢许多国家给予法院的密切合作，无论是提供信息、组织证人旅行、提供文件还是冻结资产。然而，在一个领域，即执行逮捕令方面缺乏成功合作，对国际刑事法院履行任务的能力构成主要障碍。

这一令人担忧的状况有一个重要方面涉及联合国。未执行的逮捕令中有一半以上——确切地说是八份——涉及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国际刑院检察官的局势。利比亚和苏丹当局与国际刑院充分合作的义务来自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各项决议。我敦促安理会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利比亚和苏丹当局执行向它们提出的合作要求，特别是在逮捕和移交目前在逃的嫌犯方面。

(以英语发言)

这些案件涉及的严重犯罪行为的指控没有在任何法院得到适当审理，这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不可接受，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不可接受，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也不可接受。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国际刑院的一般运作方法：在正当程序最强有力的保障下，为每一个在国际刑院出庭的嫌疑犯举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公平听讯。这一点必须强调。

现在我要简要总结一下法院过去一年的活动。在对三名被告进行的两次审判中作出了最终判决，即关于被告是否有罪的初审判决。

其中一起是对博斯科·恩塔甘达先生的审判，他被判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区犯有18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辩方已提出上诉，该上诉仍悬而未决。

这两起审判中的第二起涉及洛朗·巴博先生和查尔斯·布莱·古德先生的案件，此案与科特迪瓦境内据称的选举暴力有关。审判分庭在检方陈述证据后，根据被世界一些地方的律师恰当地称为“无案件事实可辨”的观点，宣布两名被告无罪。检察官对判决提出上诉，该上诉仍在审理中。

第三起审判涉及多米尼克·翁古文先生，法院继续听取辩方申诉。该案涉及对在乌干达北部所犯罪行的指控。

关于即将开审的新案件，最近确认了针对哈桑·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先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指控，这些指控涉及据称在马里廷巴克图实施的行为。除非预审分庭就被告提出的未决上诉作出肯定的裁决，审判预计将于明年开始。

法院针对中非共和国二号情势发出了第一份逮捕令。该情势涉及2012年该国境内爆发的武装暴力。在此情况下，阿尔弗雷德·耶卡托姆先生和帕特里斯-爱德华·恩加松纳先生分别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被移交法院羁押。预审分庭目前正在进行审议，之后将就是否确认相关指控作出裁决。已在9月至10月就这些指控举行听证会。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除预审司和审判司在开展工作时，上诉分庭也极其繁忙。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是，上诉分庭就约旦哈希姆王国未能执行法院对奥马尔·巴希尔先生发出的逮捕令一事所涉及的合作问题作出判决。在法院提出合作要求时，奥马尔·巴希尔先生是当时的苏丹总统。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在所提及的那个时期担任总统的

巴希尔总统是否受到国际法赋予他的豁免权的保护而不受逮捕。

在为期一周的听证会上，上诉分庭听取了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在这一主题事项上具有专长的几位法学教授的陈述，随后发布了对该案的判决。上诉分庭在判决中裁定，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国际法不承认巴希尔先生对法院享有任何豁免权。这必然是一项冗长的裁决，因为它澄清并解决了这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将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判例。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其他事态发展中，检察官要求获得司法授权，以便就据称对缅甸罗兴亚人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展开调查。缅甸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其行为包括将受害者驱逐到孟加拉国，而孟加拉国是《规约》的缔约国。这项请求是第一预审分庭作出初步裁决后提出的。初步裁决指出，如果法院管辖权内某项犯罪的至少一个要素或这项犯罪的一部分是在《罗马规约》缔约国境内实施或完成的，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

关于阿富汗，预审分庭驳回了检察官授权对这一情势展开调查的请求。此后，检察官和一些受害者代表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该上诉目前正等候上诉分庭审理。检察官就此情势提出这一请求是基于据称的事件发生在《罗马规约》缔约国阿富汗境内或据称的侵权行为也发生在《罗马规约》的其他缔约国境内这样一种理论。

大会无疑知道，此事导致人们、特别是对预审分庭的裁决深感失望的受害者团体代表对法院议论纷纷。但是，如果大会记录没有提到这起争议也是由美国政府前国家安全顾问和前国务卿分别对法院发出的直接政治威胁引起的，我就此事所做的报告必然是不完整的。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在任何实行法治的社会中都是不应出现的。但是，法院在开展工作时必须对威胁和议论无所畏惧，无论这些威胁和议论是来自对他们不喜欢的裁决深感失望的受害者，还是来自急于阻止他们不想要的裁决的国

家官员。国际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必须确保法院履行职责、造福人类所需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胁。

检察官在加蓬完成了初步审查，认定现有信息没有为认为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已经发生提供合理依据。因此，她拒绝展开调查。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8个潜在情势进行初步审查，并正在对11个情势进行调查。

我应该谈谈根据《罗马规约》制度正在开展的赔偿性司法工作。1万多名受害者获准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并要求对他们所遭受的伤害给予赔偿。赔偿性司法最近受到重视是一个重大的范式转变，与几乎只注重惩罚性司法的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法庭的诉讼程序形成鲜明对比。国际刑事法院受害者信托基金正在执行法院就赔偿问题发布的首批司法命令。

艾哈迈德·法齐·马赫迪先生承认犯有在马里廷巴克图破坏宗教纪念碑这项战争罪。在这一案件中，法官下令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一系列赔偿措施，其中包括：向依靠这些受保护的遗址谋生的人逐一提供赔偿、公开表示承认造成了精神伤害的象征性措施、旨在恢复已丧失的经济活动的社区措施、以及传播马赫迪先生以廷巴克图语所作的道歉。

在另一个案件，即热尔曼·加丹加先生一案中，法官裁定向个人提供象征性的金钱赔偿，但也要以心理支助以及住房支助、创收活动和教育等形式提供集体赔偿。

总体构想是，赔偿措施的具体目的是解决受害者因法院已判定被告有罪的那些罪行而遭受的损失。如果被告有经济能力，钱财将被扣押并用于赔偿。但是，如果被告没有经济能力，被害人信托基金可以利用来自政府和私人捐助者的自愿捐款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此外，在法庭的所有案件之外，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几十万受害者在被害人信托基金的援

助任务之下，已受益于其各种方案。援助任务规定信托基金工作的一个层面，力求为犯罪行为的明显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而不受制于证明肇事者犯有侵害受害者之罪的考虑。信托基金目前正在扩大其对中非共和国的援助任务范围，并研究在若干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项目的可行性。

我必须指出，信托基金发挥作用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财力。在这方面，我强烈敦促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向被害人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以支持其在这方面的重要工作。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重申国际刑事法院对我们世界的根本价值和红利。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就在1998年通过《罗马规约》的几个星期前，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提醒世界：人类已经在彼此间造成了足够多的恐怖，并指出，如果已经有一个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国际刑事法院，这其中的许多恐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至少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马迪巴所希望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一个常设机制，以确保最终对那些使他人遭受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恐怖行为的人追究责任，而今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些罪行都有管辖权。在其17年的运作过程中，国际刑事法院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事实上，国际刑事法院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对上述残暴罪行追究责任的方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通过《罗马规约》时所说的话：

“直到现在，当强势者犯下危害人类罪时，他们知道，只要他们依然强势，任何世俗法庭都无法审判他们。”

这一看法抓住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根本宗旨及其对人类的永恒价值。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现在已经设立，即使是最强势者——通常都是男性——将再也无法肯定他们如果对自己同胞犯下《罗马规约》所禁止令人发指的罪行，还能逍遥法外。

与此同时，即使目前的情况似乎让有罪不罚成为可能，但犯罪者及其同谋现在必须认识到，他们逍遥法外在世人眼里始终是非法的、可被指控的，而且只要我们有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国内没有提出的最终追究责任的问题，这种情况就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人反对，甚至是强烈的威胁反对，但只要我们有国际刑事法院在运作，就终究会提出这些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刑事法院所带来威慑的关联价值。威慑是一种无论如何大力强调也不为过的价值。有许多理由坚持认为，对于那些倾向于犯下大规模或广泛不人道罪行者的自由意志而言，仅仅是这一常设司法问责机制的存在，至少也确实构成一种不方便的障碍。

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方面的价值在非洲——我本人所属区域——的选举中尤其明显。在非洲历史上，暴力经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通过对平民人口进行广泛或有系统攻击——实质上形同危害人类罪——的形式来获得政治权力。自从国际刑事法院设立、开始审理关于选举暴力的第一批案件以来，选举暴力的发生率显著下降，而选举暴力总是会破坏民主经验，将这种暴力用来以民主的名义获得权力。

正如在座一些人所知，我在涉及2007年和2008年选举后暴力的某一案件中担任主审法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听取了一名专家证人的证词。他作证说，在所涉及的选举之前，该国过去的选举常常受到暴力事件的破坏，而这些事件往往会随着选举的展开变得越来越激烈。但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审理2007年和2008年暴力事件之后，在该国随后的选举中，选举期间发生暴力事件明显减少。

各国领导人、政府部长和民间社会领袖还告诉我，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和工作在防止其国家选举期间的流血事件方面一直在发挥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不管是谁犯下这样的暴力，最终都会在国际刑事法院面前为其行动承担责任。单是这种威慑的价值就足以作为对国际刑事

法院投资的回报，也就是说，那些资助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的人可以放心，他们投入的资金并没有浪费掉。

但是法院的重要价值远不止是这些成就。我必须强调，国际刑院在可持续经济和人类发展方面也有明显的价值，《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形式，相当正确地坚持了这一点。

它的主张很简单：在冲突、暴行和恐惧大行其道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大会一些成员可能听我说过这一点，但是，它的重要性值得重申：如果人们因为各种武装冲突的暴力而死亡、受伤、受到终身精神创伤；如果数百万人因为战争造成的经济放缓而无法工作；如果农民因为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或仍然有杀伤力的地雷而不能去农场；如果企业家因为激烈战事一再导致经济基础设施破坏而无法经商；如果孩子因为战争而不能上学；如果原本就经常稀缺的宝贵资源被浪费在武器上，而不是投资于教育、保健和经济可持续性；如果投资者被冲突和不稳定吓跑；如果各国最优秀的人才被迫成批逃离，寻找更安全的国家；如果邻国乃至更远的国家需要竭力应对逃离战乱国家的难民潮——那么社会经济发展仍将只是空想。

今年早些时候，利比亚经济部长描述了利比亚当前的冲突如何严重破坏了该国的基础设施，光是利比亚的外汇储备就损失了400多亿美元。这一证词证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长期以来关于武装冲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说法。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重要研究报告——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

“内战的平均成本相当于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30多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值。重大暴力事件后需要20年才能恢复贸易水平”。

此外，这些负面影响不会停留在国界之内。必须强调，冲突的影响不仅阻碍直接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增长，而且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移民问题之外，还阻碍区域发展。

我们也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战争的代价在其他方面可能更令人沮丧，因为据估计，两次世界大战的总成本约为20万亿美元——按今天的货币计算为20万亿美元——约占世界上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即四分之一。这个数额放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仅仅是浪费在两场战争上的钱。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我们应该考虑所有其他战争的代价。

很难想象，如果把所有这些钱都投入到通过科学、教育和发展来试图解决世界上一些更棘手的问题，人类就会过得更好。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同样的20万亿美元投入到额外的研究资金中，比如乳腺癌或其他癌症或另一些每天都让人类心碎的疾病，会发生什么。

综上所述，预防冲突及其滋生的暴行，并通过法治而目标明确、毫不辩解地加以解决，是对人类生活中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最关键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目标。这是全世界的目标；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更不用说长期不受其影响。在这方面，我必须强调，没有什么屏障能够坚固、深长、高耸或险峻到让任何国家永远与人类苦难的浪潮隔绝，每当有人犯下《罗马规约》所禁止的罪行，或者没有国际机制来坚持长期问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浪潮会滚滚而来。

《罗马规约》作为一项多边文书，只要以可行的方式填补空缺，就有助于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为此，它将侵略战争定为刑事犯罪，并强调在武装冲突中犯下战争罪时——每场战争都难免出现这种情况——不论是谁先开枪，不论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是否在武装冲突的掩护下发生，都可能会受到刑事诉讼。这样一来，国际刑院对那种倾向于毫不在意地将本国人民和其他人推入利己武装冲突的思想施加了必要压力。

人人都应该能够诉诸司法，可持续发展目标16就敦促我们确保做到这一点。然而，目前有7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实际

上，这意味着，当尚未批准或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领土内发生暴行罪时，国际刑院根本无法处理某些引起世界关注、让世人良心和道德不安的悲惨冲突。换言之，这种暴行的受害者被置于《罗马规约》体系建立的惩罚性和赔偿性正义的领域之外。因此，他们是三重受害者：一是最初受到暴行所害，二是犯罪者在最终司法手段——国际法院——缺位的情况下似乎可以逍遥法外，三是《罗马规约》体系建立的赔偿制度完全未能落实。

在这种时候，我必须重复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的话：

“我敦促所有尚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加入《罗马规约》，将此作为一项慎重的国家政策，以使《罗马规约》成为一项普遍条约。”

这不仅是一个它能为任何特定国家带来什么的问题，尽管特别是威慑的一般和总体惠益已经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个为人类的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问题。多一个国家批准该规约就是为保护人类免遭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罪行侵害的壁垒添加一块砖头。多一个国家批准都有助于减少有罪不罚的空间。多一个国家批准都有助于提供补偿和援助，可以有组织和有系统地利用这些补偿和援助满足受害者对正义的渴求，即使是当其他一切办法都失败时，以最具象征性的方式这样做。

（以法语发言）

我再次感谢与会者的关注，并祝他们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A/74/L.8。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荷兰王国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于今天晚些时候作的发言。

我们还要对艾博伊-奥苏吉院长的介绍表示感谢，并对他和他的团队持续努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表示赞赏。国际刑院的年度报告（见

A/74/324）明确概述了国际刑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面临的各种挑战。荷兰王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自豪的东道国和坚定的支持者。

鉴于审议中的议题极为重要，请允许我谈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第二，加强国际刑院；第三，合作。

首先，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荷兰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必须将大规模暴行的实施者绳之以法。遗憾的是，目前，问责制和国际刑法正在承受严重压力，并面临政治阻力。安全理事会经常因有人在这些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而受阻。由于有人行使否决权，安理会未能在最需要追究大规模暴行实施者责任的局势中追究这些施暴者的责任。叙利亚就是这方面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国际刑事法院是各国设立的法院。遗憾的是，尚非所有国家都愿意加入我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但我们继续努力争取各国普遍加入。同时，我们不能坐等。我们需要确保国际刑院尽力而为。

第二，关于加强国际刑院，如我所言，荷兰是国际刑院的坚定支持者。国际刑院体现这样一个想法，即最严重的罪行令整个国际社会感到关切。这些罪行不应不受惩罚。国际刑事法院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不可或缺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刑院。我们必须使国际刑院变得效率更高，能够作出高质量的判决，并且有能力顶住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压力。我们不能允许非国家行为体阻止对国际刑院起诉的最严重国际罪行追究责任。荷兰王国赞成通过缔约国大会加强国际刑院的措施，例如，在选举法官之前更严格地审查所有候选人是否合适。此外，我们支持由独立专家对国际刑院的运作情况进行全面审查。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目前最大的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办法。

第三，我们需要更严格地审视我们作为国家和联合国机关在国际刑院执行其任务时与国际刑院的合作。在我们看来，所有国家都应与国际刑院合作。它们应根据《罗马规约》或安全理事会决议

规定的义务执行尚未执行的逮捕令。此外，各国的自愿合作对于国际刑院的有效和高效运作也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支持国际刑院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缔结关于迁移证人、释放人员和执行判决的框架协议。缔约国和安全理事会还应采取具体行动处理查明的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此外，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对它提交国际刑院处理的局势采取后续行动，并加强合作。缔约国需要支持和推动国际刑院在其司法诉讼的各个阶段开展的工作。

尽快处理上述所有问题至关重要，以期在2020年于纽约这里举行的缔约国大会上作出具体决定，届时我们还必须选举一名新检察官和六名新法官。我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支持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这个重要的机构。我呼吁尚未批准《罗马规约》和加入我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斗争的会员国批准该规约和加入这一斗争。我们的抱负仍然是普遍性：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成为缔约国。

最后，我荣幸地介绍文件A/74/L.8所载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欢迎国际刑事法院最新工作报告。这项决议草案还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在多边体系中的作用，这一体系旨在依照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消除有罪不罚现象，促进法治，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实现可持续和平，推进各国的发展。我将这项决议草案提交大会供不经表决通过。我真诚感谢所有联署这项决议草案的国家。共同提案国的数量清楚地表明，成员们极为重视国际刑院的年度报告。

埃内斯特伦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北欧五国，即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自己的国家瑞典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向联合国提交年度报告（见A/74/324）。我还要感谢国际刑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透彻地介绍该报告所述主要问题。

在世界各地许多冲突和局势中，有人正在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不受惩罚。国际刑院及其在坚持补充性原则的情况下追究最严重罪行实施者的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至关重要任务授权，在追求国际正义方面仍然至关重要。国际刑院在促进基于规则的秩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能为推进冲突后建设和平与和解作出贡献。

然而，法院现在面临一些挑战。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和法院必须以有效的方式迅速应对这些挑战，包括通过仔细和依照轻重缓急有效地利用资源，不断提高成效和影响力。北欧国家欢迎缔约国、法院和民间社会目前正在开展的这方面工作。法院必须能够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北欧国家支持法院的这方面努力。需要加强《罗马规约》系统和法院，以应对这些挑战，实现《规约》起草者的构想。

各国的普遍加入，是充分发挥国际刑院乃至国际司法潜能的核心。缔约国数量的增加，将使法院能够更好地处理最严重的国际罪行，提高其工作的连贯性和影响。北欧国家继续支持各国普遍加入《罗马规约》。我们随时准备建设性地讨论一些缔约国在与国际刑院关系方面遇到的挑战。根据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鼓励建设性讨论法院工作可继续改进的领域。继续对话至关重要。

法院能否有效地履行其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其他利益攸关者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我谨在此注意到报告所述联合国与国际刑院之间持续合作。我们同法院一样，对联合国高层领导所提供的重要支持与合作深表赞赏。我们也欢迎联合国其他实体、各部、厅、特别顾问和秘书长代表为法院提供业务支助。在各种联合国报告、决议、宣言，及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通过的其他文件中肯定和支持法院活动，使国际刑院在联合国系统中主流化依然重要。

仍然需要加强法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解决不与国际刑院合作的问题，及加强对安

全理事会移交局势的后续行动。我们注意到，法院报告，在安理会把达尔富尔和利比亚局势移交法院之后，法院致函安理会，认定有15个国家不合作，但安理会未对这些文函作出任何实质性回应。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国家按照《罗马规约》和安全理事会所有适用决议，与法院充分有效地合作。

我们也非常关切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无法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院。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敦促安理会成员继续努力。关于叙利亚局势，北欧国家特别强调，我们将继续支持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我们鼓励其国家也这样做。

缅甸局势，特别是若开邦发生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报道，仍然令人严重关切。我们对缅甸问题实况调查团最新报告的结论深表担忧。我们敦促缅甸当局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可信的调查。人权理事会建立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以收集、整理、保存和分析自2011年以来缅甸境内犯下的最严重国际罪行和违反国际法罪行的证据，是朝着问责迈出的又一重要步骤。但是，安全理事会将此案移交国际刑院，仍然是在缅甸问题上实现问责的最有力手段。

全面落实受害者权利，是确保国际刑院继续获得成功和具有现实意义的要素。我们赞扬国际刑院被害人信托基金的重要工作，赞赏地注意到该基金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罪行受害者提供支助，帮助他们康复。北欧国家一贯支持该信托基金，我们鼓励各国和其他实体为其捐款。

也让我借此机会，对检察官和她不懈努力伸张正义，惩处暴行，表示赞赏。我们赞扬检察官打击针对或以其他方式危及儿童的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罪行与暴行。

为了使法院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履行使命，也需要提供适当的资金。今年晚些时候缔约国大会将讨论法院预算，但我们谨强调，法院工作遍及全

球，其工作量大，如同法院报告所述。在需求不断增加之时，确保法院有足够的资源执行重要任务，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同样，法院也有义务确保其本身运作有效。

最后，让我重申，北欧国家承诺，我们将继续坚定地支持国际刑院，继续致力于维护法院的有效性、独立性和完整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夏布罗先生（欧洲联盟）（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稳定与结盟进程国及潜在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也赞同这一发言。

我们谨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的详细通报，感谢法院向联合国提交的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年度报告（见A/74/324）。这一年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态发展。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它是推进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实现持久和平，确保追究违反犯罪者责任的重要机构。法院仍然是所有国家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重要保障，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威慑作用。我们也强调法院行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现实影响，因为我们认为，司法机构强是可持续发展与稳定的先决条件。

我们注意到，报告所述期间，判例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若干司法诉讼案及初步审查和调查取得进展，导致包括签发了两份新的逮捕令。法院活动的地域范围及与法院的信函往来不断增加，说明大多数国家继续将国际刑事法院视为维护司法正义和问责制的衡量标准。我们也欢迎国际刑院被害人信托基金承诺履行为对影响国际社会、家庭和社区的最严重罪行的受害者提供赔偿的任务。

报告所述期间，法院的工作量包括检察官对11起案件展开调查，另有10项初步审查和3项审判在进行。检察官办公室还对世界各地的几个国家进行了大量访问。

为了使法院能够处理其巨大的工作量，并作为一个机构保持其现代性和有效性，以应对当今的挑战，它必须不断发展，适应这些新的挑战，并尽可能发挥效力。我们欢迎并支持一切努力，以修订和精简法院的行政和司法程序，并优化利用现有资源。

法院的正常运作方面仍然面临一些严重的挑战。我们欢迎各国在调查和起诉以及法院提出的其他请求方面提供的援助，但我们强调，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密切合作仍然至关重要。我们特别关切的是，逮捕和移交法院授权任务所涉人员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敦促所有国家采取行动，促进与法院充分、适当的合作，包括迅速执行逮捕令，与法院就执行判决、临时或最终释放嫌疑人以及重新安置证人等事项达成自愿合作协议，所有这些对实现法院的效力来说都至关重要。

欧盟及其成员国完全同意法院的看法，认为安全理事会将事项提交法院的能力有助于在犯下影响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罪行但法院又没有管辖权的国家促进追责。我们还强调，安理会必须采取严格的后续行动，以确保在安理会向法院提交案件时与法院合作。

《罗马规约》的核心是补充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家本身对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负有主要责任。欧洲联盟一如既往，继续致力于落实这一基本原则，为此利用各种援助工具和项目，特别是旨在提高各国法律和司法能力的各种方案，作为其加强法治努力的一部分。实现对《罗马规约》的普遍批准仍然是我们的长期目标。在报告所述期间，欧盟继续努力促进《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的普遍性，促进对法院授权任务的进一步了解。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重申，我们决心

与缔约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一道鼓励对《罗马规约》尽可能广泛的参与，并维护《罗马规约》的完整。

欧洲联盟一再表示坚信法院的合法性，我们完全相信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在依照《罗马规约》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履行职责时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欧洲联盟一如既往，继续致力于捍卫法院不受任何旨在阻碍司法和破坏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外部干涉。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在多边论坛和双边对话中申明对法院的支持，并向法院提供连贯一致的政治、财政和技术援助。我们的共同努力将使法院强大并真正具有普遍性，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追究那些犯下影响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罪行者的责任的法院，让无辜受害者发声并给予他们新的希望。

Węckowicz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波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代表其成员国所作的发言。我们愿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作为补充。

首先，我们要感谢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就国际刑事法院的年度报告（见A/74/324）向大会通报。报告显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繁忙的活动，并证明了它在国际刑事司法架构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它还没有达到《罗马规约》签署国所期待的程度。世界对国际刑事法院既抱有希望又感到不安。《罗马规约》缔约国更多地满怀希望地看待它，而非缔约国则更多地感到不安。后者承认法院的作用，并偶尔与之合作，但有时质疑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我们希望，法院的努力勤奋和系统性的工作及其丰富的判例法将促使非缔约国改变后一种做法。

波兰仍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法院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在我们即将届满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任职期间，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促进国际法这项工作上。由波兰倡议召开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加强国际法的高级别辩论会（见S/PV.8262）的结论之一是，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需

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执法，这是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也是波兰支持法院活动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注意到需要改进法院的工作方法和效率。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法院的运作需要大刀阔斧的精简。因此，我们期待收到最近启动的国际刑事法院评估机制的结果和提出的改进建议。我们认识到，适当填补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位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高度重视新检察官的遴选过程，因为其选择和适当准备案件的任务是法院诉讼程序的基石。

法院正在运作，并将始终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运作，必须作出艰难的决定，一方面权衡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权衡起诉犯罪者的可行性。在这方面，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重大责任也凸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实现正义的承诺是一个持续的进程，需要法院——特别是检察官办公室——和缔约国的共同努力。

波兰要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本身没有必要的资源来确保其逮捕令得到执行。因此，法院必须不断寻求加强各国的信任，因为它们的支持是法院有效工作的先决条件。信任还能加强业务合作和筹资。

波兰准备在进行调查和司法工作方面与法院合作。我们认为，如果不同各国和国际组织合作，法院几乎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合作必须植根于补充性原则，这一原则仍然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础。起诉犯下最严重罪行者是各个国家肩负的重要责任。

补充性原则是对法院范围极为广泛的领土管辖权的部分补救。有效的国内诉讼为检察官的酌处权建立了一个适当的框架，并有助于限制法院的业务开支。

最后，请允许我冒昧重申，我希望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其勤奋、系统的努力及其判例的质量，说服那些尚未信服的人，并让那些已经信服的人放心，支持这一独特的国际司法机构是正确的，值得付出一切努力。

什帕切克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但我同时要以斯洛伐克国家代表的名义发表进一步的意见。

首先，我要感谢奇利·艾博伊-奥苏吉院长的全面通报。我也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关于其2018年和2019年活动的报告（见A/74/324）。

大会关于该报告的辩论会是联合国与国际刑院的重要机构联系之一，并为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讨论这一独特司法机构的工作提供了平台。

1998年罗马会议创建了对国际法规定最恶劣罪行拥有管辖权的唯一常设国际司法机构。光是法院的存在本身就反映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坚信问责必须是解决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满足正义和人道的要求，很难想象一个受冲突蹂躏的社会如何能够回到可持续的和平与常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近14000名受害者参与了法院审理的案件，这有力地证明了人们普遍呼吁正义，也证明了法院与一些具体情况切实相关。这些受害者必须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不仅是以正当程序的形式，还要获得赔偿和援助，以便他们能恢复正常生活。

法院只有实现普遍性，才能通过终结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和侵略罪施害者的有罪不罚现象来履行使命。我们应该集中所有政治努力，始终进行以国际刑院核心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开、耐心的对话，旨在继续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防止有罪不罚。与此同时，应鼓励非参与国加入《罗马规约》体系，以消除领土或个人管辖权漏洞，以免施害者逃脱法律制裁。

关于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联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有着与生俱来的共生关系。根据《罗马规约》第十三条（2）项规定移交案件的可能性扩大了安全理事会在处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可采取的措施范围。斯洛伐克鼓励安全理事会使用这一独特工具，在发生国际罪行和对起诉这些罪行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当局无法起诉的情况下移交案件。然而，除非安全理事会对移交采取适

当的后续行动，包括确保会员国的合作，否则这一行动不会带来预期结果，利比亚局势和苏丹达尔富尔局势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国际刑事法院发布了几项裁决，包括关于与法院合作问题的裁决。国际刑院的判例在进一步发展和澄清国际刑法问题以及支持和指导打击有罪不罚的国内努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为了让这种潜力成为实际贡献，法院需要特别注意为其裁决提供明确、详细、有理有据的推理。

最后，我要重申，斯洛伐克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支持填补国际法所规定罪行方面的有罪不罚漏洞的更广大事业。这一观念也清晰地反映在斯洛伐克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副主席和大会主席团纽约工作组协调员的全力服务中。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向大会通报了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过去一年活动的报告（见A/74/324）。我还要感谢艾博伊-奥苏吉法官介绍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3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援助所产生费用和收到补偿的报告（A/74/325和A/74/326）。

阿根廷还希望，大会将像往年一样，在今天就该议程项目进行通报和辩论的同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报告的决议草案（A/74/L.8）。

通过自去年报告（见A/73/334）通报（见A/73/PV.28）以来的出色活动，法院再次以实践表明，它是打击有罪不罚、促进人权和巩固国际法治的一个基本工具。阿根廷重申对法院的持续承诺，继续积极参与缔约国大会规定的各个机制，以实现该规约的普遍性为目标。

阿根廷以各种方式表达了支持，但我们尤为自豪的是，我国是第一个缔结法院建议的四项合作协

议的缔约国。阿根廷还批准了关于侵略罪的坎帕拉修正案，因此欢迎法院启动对这一罪行的管辖权。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选举国际刑事法院下一任检察官的进程取得了进展，即通过了检察官选举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职权范围，至今为止也完成了一些工作。对阿根廷来说，确定经验丰富、有口皆碑的候选人是关键所在，他们将继续现任检察官的工作，始终尊重性别和地域平衡，并充分代表世界上的主要法律制度，以此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原则。

我们还欢迎独立外部审查进程的积极进展，这将对整个《罗马规约》系统的运作进行必要调整的良机。由缔约国大会主席领导的这一进程只有继续保持迄今为止所展现的透明度和包容性，才能拥有它取得成功所需的合法性。

我现在要提及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本组织与法院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以尊重法院的司法独立为指导。在这方面，我们重申阿根廷对安全理事会移交法院审理的一些局势，特别是这些移交案件的财务费用的某些关切。尽管《罗马规约》和《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中载有明确的规则，而根据这些规则，移交案件费用必须由联合国承担，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费用完全由缔约国承担。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以及联合国的一项目标，但这一目标要求承诺为法院提供必要的资源，使之能够开展其工作。在这方面不作为可能危及法院正在进行的调查，并影响本组织的信誉。我们还认为，法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附属机构，如各制裁委员会或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工作，还有扩大和改进的余地。

最后，阿根廷谨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对联合国在国际一级打击最严重罪行不受惩处现象的目标所作的贡献。的确，法院对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一个旨在促进尊重人权与实

现持久和平的多边制度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最严重罪行的受害者遭受痛苦是人类最大的耻辱。我们必须确保以强有力的对策来打击这种罪行，以便我们能够在国际法至上的原则下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德拉福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感谢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向大会介绍法院活动的年度报告（见A/74/324）。我们也感谢他发挥领导作用，并向他保证墨西哥将予以全力支持。

自2006年以来，墨西哥就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墨西哥通过担任主席团成员以及修正案工作组主席，积极参加了缔约国大会的工作。此外，我国是我们今天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A/74/L.8）的共同提案国，也是国际刑事法院之友小组的成员。就美洲国家组织而言，墨西哥是该组织大会每两年提出和通过的决议的起草国，该决议鼓励美洲国家批准《罗马规约》，在国家一级执行其规定，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努力并不仅限于支持和加强法院本身，而且还包括传播《规约》的内容以及基于《规约》本身的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情况。在这方面，作为我们不断更新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墨西哥今年举办了一个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年度课程，其中一个部分侧重于国际刑事法院。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法院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重要司法进展。在过去的一年，法院和各国都面临新的挑战，无论是在体制上，在实际方面，还是在法院和缔约国之间以及与非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在体制层面，墨西哥欢迎旨在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进行研究的倡议，这是法院本身所要求的。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在各方面加强法院，我们重申墨西哥致力于为此继续努力。

我们还要强调，缔约国有责任选举下一任检察官，并通过缔约国大会调整必须集体商定的所有方面，以便法院继续有效地履行其任务。我们也支持瑞士的倡议，即修订《罗马规约》，以便认定国际

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饥荒罪。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问题在修正案工作组中的进展，并希望不久将作出决定，以便能够在12月将该问题提交缔约国大会通过。

关于与法院司法实践有关的问题，今年解决了各国与法院之间合作的相关问题、以及法院实践是否符合其他国际准则的问题。法院还处理了其他复杂问题，如《规约》所产生实质性义务的解释以及法院在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情况下的管辖权范围。同样，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法院在此期间所发出逮捕令得到迅速执行。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法院的报告载有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具体建议和具体行动。我们特别重视法院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进行互动，也重视缔结促进与其他机构协作的协定并作出承诺，视之为积极的行动。联合国拥有必要的结构和机构，使各国能够在与法院相关的事项，如法治、人权和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建设能力。这方面的各项协定避免工作的重复，并加强各机构履行其所承担任务的能力。

最后，我要重申，墨西哥致力于国际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加强《罗马规约》所建立的制度，以防止肇事者犯下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罪行而不受惩罚的情况。在这方面，在今后几个月里，墨西哥可望批准2010年在坎帕拉和2017年在纽约通过的对《罗马规约》第八条第2款的修正案。

Fox-Drummond Gough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20多年前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体现了价值观和思想在现实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来自各个区域的国家基于人类尊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国际正义理念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旨在调查和惩处最严重国际罪行的机构。如同任何人类努力一样，国际刑事法院既展现了成就，也显示了不足。让我们庆祝取得的胜利，例如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和刑院成功的外联活动，同时思考我们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自豪的创立者，巴西高兴地看到，刑院已牢固确立自己作为第一个被构想来打击最严重国际罪行有罪不罚现象的常设法庭的地位。刑院确保在其面前受审的人得到公正审判，并且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因此是促进正义与和平的重要工具。

刑院的年度报告（见A/74/324）清楚表明了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处理了大量工作。自20年前成立以来，刑院受理了27起案件，涉及45名嫌疑人或被告，并对11个局势进行了调查。巴西欣见，两项新的逮捕令得到了迅速执行，嫌疑人已被移交刑院拘留。这是成功适用《罗马规约》合作规范的积极事例。

另一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受害者信托基金的工作有关，该基金提供赔偿的任务授权是促进受害者诉诸司法权利的关键所在。为实现报复性和恢复性司法二者之间的平衡，《罗马规约》载有一整套复杂的关于受害者权利的条款，以使受害者能够参与诉讼并申请赔偿。看到关于当前项目以及信托基金与受害者及其家人和受影响社区接触的报告，这令人感到鼓舞。我们还赞扬在加强国家能力中看到的积极合作层面。

所有缔约国均有责任继续努力改进《罗马规约》系统，应对挑战，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一个重要挑战与普遍性有关。我高兴地回顾，不仅所有南美洲国家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而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也是缔约国中的第二大区域集团，仅次于非洲集团。

第二个挑战涉及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巴西重申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移交案件供资问题的长期关切。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对刑院履行其任务授权的能力有很大影响。我们再次呼吁执行《关系协定》第13条和《罗马规约》第115条（b）项，这些条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即此类费用至少部分应由联合国提供的资金支付，而不应仅由《规约》缔约国承担。同样重要的是应强

调指出，正如《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所规定的那样，大会负有审议和批准本组织预算的专属责任。为安全理事会移交案件提供适当资金将提高刑院和联合国的公信力。目前的状况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

第三个挑战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当前讨论的核心。各种行为体呼吁审查《罗马规约》制度。作为缔约国，我们应加紧努力，共同加强国际刑事法院。对巴西来说，任何审查进程都必须维护刑院的起诉和司法独立性，这是任何合法司法机构的基石。巴西正在密切关注海牙和纽约的讨论，并期待着12月的缔约国大会进行富有成效的辩论，为届时作出的决定作出积极贡献。我们认为，应当让缔约国充分参与一切审查进程，因为这将赋予审查工作所需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缔约国大会将作出有关审查的所有重大决定，特别是有预算影响的决定。

寻求和平与正义总是充满挑战，这一挑战是寻求更公正和更有合作性世界秩序所固有的。和平与正义相辅相成。它们是共同价值观的一部分，这种价值观使第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成为现实。巴西仍然坚定致力于《罗马规约》体系以及推动创立这一体系的价值观。

川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奇利·艾博伊-奥苏吉院长的奉献和领导，以及他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综合报告（见A/74/324）的通报。

日本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且高度重视促进法治。因此，日本自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就一直给予支持。我国政府的长期政策是帮助使国际刑事法院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有效和可持续地运作。除为国际刑院提供最多资金外，我们还致力于以主席团成员身份并通过合格的人力资源支持国际刑院。

今年是《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0周年，这是迈向更人道世界的一大步。然而，今天，我们仍然看

到冲突中的大规模残酷行为。我们认为，问责是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伸张正义和确保没有人掉队的富有雄心的尝试。

任何机构都会经历起起落落。国际刑院也不例外。自其成立以来，十七年已经过去，现在是缔约国重申我们作为利益攸关方责任的时候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改革对刑院实现其核心任务授权来说非常重要。缔约国必须继续就我们如何加强刑院进行建设性讨论。缔约国是改革的主导者，国际刑事法院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日本致力于积极参与国际刑事法院改革和加强刑院。

请允许我强调与加强刑院有关的三个要点，即普遍性、稳定性和补充性。对于第一点，我要指出，团结起来，我们将更加强大。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在全世界有效促进法治，应有更多国家加入刑院。从长远来看，国际刑事法院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真正有普遍性的刑事法院。我们呼吁尚未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加入《规约》。作为缔约国，我们必须继续与非缔约国接触，强调《罗马规约》系统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有必要采取分步走的办法来赢得更多国家的理解与合作。国际刑事法院仍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组织，急于求成将危及我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努力。日本认为，对国际刑事法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不懈努力并取得稳步进展。

现在谈最后一点，关于补充性，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是补充国家刑事管辖权。刑院的存在并不会削弱国家管辖权在起诉严重罪行中的重要性。将这一原则纳入法院的活动也将有助于增强法院的普遍性。日本认为，检察官办公室可通过注重调查的可行性和补充性原则，并适当确定问题的优先次序，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完成其核心任务。

最后，我们希望，国际刑院将继续辛勤地开展工作，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同时巩固其信誉。日本将继续大力支持国际刑院的工作。

斯科特-凯米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是《罗马规约》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体系旨在确保国际社会关切的最严重罪行责任人受到审判。对暴行追究责任对于在冲突后局势中保持和平和支持和解至关重要。调查并酌情起诉大规模暴行责任人的首要责任在于各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国际刑院作为在本来拥有管辖权的国家无法或不愿行使管辖权的情况下最后诉诸的法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补充原则当然对法院的成功至关重要。

我们欢迎法院今年取得的各项主要成就。我们尤其想到博斯科·恩塔甘达被判犯有18项危害人类罪，特别是性奴役和战争罪，包括使用儿童兵。我们还提及一点，即，在逮捕令发出后两名被告被迅速移交法院羁押。我们还欣见，改革进程正在进行，以期支持建立《罗马规约》设想的强有力的有效机构，并加强法院履行其核心任务的能力。明年将选举新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次选举也将是至关重要的。法院必须专心致志地通过公平、迅速地开展审判程序，完成其核心任务，检察官办公室也必须专心致志地确保向法院提交准备充分、证据充足的案件。

国际刑院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完成我们所赋予的重要职责。我们呼吁联合国系统确保法院得到充分和一致的支持。我们绝不能忽视公正一致的司法在国际社会处理冲突造成的创伤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实际上，国际刑院和联合国正在奋力实现同样的目标。《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主要宗旨，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罗马规约》相一致。我们听到检察官一再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其移交法院的情势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并给予支持。安理会急需为法院就其所移交的情势开展工作提供政治支持，特别

是在合作问题上。联合国和法院的职责相互关联，因此，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伙伴。联合国应当向法院这个重要伙伴提供履行其职责所需的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迄今所做的努力，并鼓励秘书长继续根据《关系协定》加强合作。

Leal Matta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介绍法院的报告（见A/74/324）。报告详细地为我们提供了法院在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活动的最新情况。

法院投入运作以来，已立案27起，涉及45名嫌疑人或被告，并对11个情势进行了调查。这表明，法院一直很繁忙。然而，与此同时，需要进行反思，因为国际刑院管辖权的特点是将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人绳之以法，从而推动保护受害者、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以及打击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行为的努力。在《罗马规约》通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国际社会为防止发生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新案件所做的努力。

我们赞赏并注意到报告提供了关于法院——包括其预审分庭、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以及检察官办公室和受害者信托基金——活动的信息。我们认为，法院的行动有助于加强缔约国的司法和法治。因此，我们重申，我国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防止暴行。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应相互支持，彼此合作，因为这么做不仅将加强两实体之间的对话和关系，而且还将使国际刑院的出色工作更加引人注目，从而为法院加强自身权威、宣传其职责以及证明各国合作的至关重要性提供了机会。

基于上述，危地马拉谨重申，我们充分尊重补充性原则，并将加强本国各项制度，以确保追究责任。在调查或起诉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的责任人时，每个国家的司法职能必须享有优先地位，

但在国家未能履行这一职能的情况下，法院的补充作用仍有其价值，因为它始终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

我们还认为，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极其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法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两机构必须携手防止各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共同努力打击此类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并为此保持定期互动。

合作是国际刑事法院赖以正常运作的基本支柱之一。因此，缔约国必须作出坚定的承诺，加强法院的能力，以便依照《罗马规约》的精神，确保追究罪责，伸张正义，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并帮助防止未来的犯罪行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确保尊重法治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不可或缺的作用。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和联合国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必须得到一个承诺的支持，这个承诺就是为国际刑院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资源。若无资源，国际刑院就无法持续进行调查。国际刑院仍然需要联合国、缔约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支持，以便开展活动和完成任务。

副主席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主持会议。

同时，我国代表团呼吁加倍努力建成一个普遍制度。朝着普遍性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大大降低有罪不罚的风险，并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动各国普遍加入《罗马规约》，并保持批准和加入进程的势头。随着更多国家加入122个缔约国行列，保护人权免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侵犯的国际制度将得到加强。

最后，我们赞扬国际刑事法院深度参与涉及性别问题的活动并彰显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的关系。我们谨向大会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坚定和持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履行其任务授权。

巴夫达日·库雷特女士（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斯洛文尼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

鉴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的重要性，我们愿发表一些补充意见。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向联合国提交年度报告（见A/74/324），并感谢国际刑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透彻地介绍该报告所述主要问题。

斯洛文尼亚对外政策仍然注重坚定促进法治。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法院，通过确保最严重的罪行不会不受惩罚，在确立这项原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大对国际刑事司法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力度至关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国际刑院在努力起诉最严重暴行和防止今后发生此类侵害行为时面临一些挑战和阻力。鉴于斯洛文尼亚与国际刑院的持续合作，我们感谢国际刑院院长上个月访问斯洛文尼亚。在他访问卢布尔雅那期间，我们得以就国际刑院的挑战、运作和作用以及与国际刑事司法有关的其他热门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

由于多边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且一再出现的压力正在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主要支持者彼此加强合作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院必须加强努力，建立有效的关系，以使国际刑院能够履行填补有罪不罚漏洞和追究责任最大者责任的任务授权，并使安理会能够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授权。两个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可提升它们自己的公信力和《罗马规约》制度的公信力。

确保各国给予充分和迅速的合作同样重要。各国必须了解《罗马规约》规定的法律义务。任何不予支持的情况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国际刑院无法有效运作，在执行尚未执行的逮捕令方面尤其如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各国普遍批准《罗马规约》对于有效吓阻最严重的罪行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对菲律宾退出国际刑院和马来西亚决定撤回其加入

《罗马规约》的文书感到遗憾。我们欢迎国际刑院继续努力与国际和区域伙伴合作，推动各国普遍加入《规约》，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并促使各国通过国家执行立法。斯洛文尼亚重申致力于促进《罗马规约》的原则及其普遍性以及对侵略罪进行起诉。关于《罗马规约》的完整性以及旨在使《罗马规约》更加协调的努力，有时需要改变，以便改进。今年，我们批准删除《罗马规约》第124条。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应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况中的饥饿作为战争罪列入第8条。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中，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刑事法院至关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起诉国际性罪行时，国家法院应发挥其作用，并获得必要的工具。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与阿根廷、比利时、蒙古、荷兰和塞内加尔共同带头发起的“司法互助倡议”提出缔结一项关于司法互助和引渡以便在国内起诉最严重国际罪行的国际公约，这将加强国家法院的能力。迄今已有69个国家对这项倡议表示支持。带头发起这项倡议的核心国家组将继续努力，推动定于2020年6月在斯洛文尼亚就一项司法互助公约进行谈判。我们谨请所有尚未加入“司法互助倡议”的国家加入这项倡议。

我们欣见，受害者信托基金的赔偿任务授权正开始在该基金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国际罪行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和社区伸张正义至关重要。我们还赞赏该基金努力处理精神健康问题，为冲突幸存受害者提供心理支持。斯洛文尼亚高兴地继续向受害者信托基金捐款。

为维护国际刑院的可信性和完整性，应对目前挑战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关于改革进程各个潜在层面的所有审议都应建立在对建设性合作持开放态度以及国际刑院、其缔约国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对话基础上。任何改革措施都应旨在就如何提升国际刑院业绩和效力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同步发布三项计划——2019年至2021年期间国际刑事法院全院战略计划以及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具体战略计划——当然就是这样一项措施。然而，应当更

多地注意到，许多问题可以也应该由缔约国自己解决。它们在缔约国大会和现有各工作组中的工作和作用应该有助于提高法院的效力，并顾及各当局的具体特点。

我们认为，为法院面临的挑战寻找有效补救办法的各种同步举措反映了法院的重要性及其在广大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坚信，在《罗马规约》系统所有主要行为体的共同努力和坚定支持下，可以顺利克服阻止法院高效运作的任何障碍。

恩法提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感谢他介绍法院的年度报告（见A/74/324），我们已注意到该报告。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最严重的罪行，应该在哪里伸张正义。应该在我们的国家法律体系中还是海牙的国际刑院伸张正义？为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罗马规约》创立了一种现代方法，将国家和国际系统联系起来处理最严重的罪行——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因此，出现了国际刑院补充性管辖权的概念，为国际刑事司法系统和国家系统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框架，它们都从这种补充性中受益。因此，利比亚在现阶段努力伸张正义的过程中与国际刑院合作，同时强调利比亚在针对我国境内所犯罪行执行国家立法时的主权原则。我们很清楚，起诉嫌犯的工作存在拖延，同时要申明，这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国家系统不想起诉和惩处犯罪者。拖延是国家安全问题造成的，我国正在进行处理。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国国家司法系统已经开始起诉多名嫌疑人，已经下达判决惩罚了一些人、宣告另一些人无罪。因此，应该尊重我们的国家管辖权。

我们强调，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应对挑战，维护正义。如果我们要加强利比亚的法治，就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努力，协助我们的民族团结政府克服当前的安全危机。这必须与确保我们政治进程取得成功的工作齐头并进。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向执法实

体提供必要支持，以便它们能够帮助加强和平与稳定，控制冲突的驱动因素和导致侵权和犯罪的新局势，没收实施这种犯罪的工具，特别是武器，并遏制武装和非法团体。

最后，我们要重申，利比亚当局决心根据反映法治的法律属地原则，追究施害者的责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利比亚司法系统是独立、透明的，一旦国家机构建立，就能够、而且必将实现社会和刑事司法。

拉什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奇利·艾博伊-奥苏吉院长的报告（见A/74/324）和他当前为国际刑事法院提供的服务。我们赞扬院长报告所反映的法院近期成就，以及法院当前与联合国的关系。我们赞赏地注意到，法院与各国、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接触，以加强它们与法院的合作、对法院的认识和支持。

新西兰大力支持法院，支持它对最严重国际罪行责任人追究责任的任务。作为唯一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它在更广泛的国际问责机制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欢迎它到目前为止对这一体系无比宝贵的贡献。法院及其《规约》逐步建立了国际刑事司法的新范式，将追究暴行罪责任作为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法院是追究最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的许多机构之一。

然而，面对国际犯罪，采取有力、适当措施的首要责任在于各国。国际刑院是审判这种罪行的独立终审法院。确保追究国际犯罪实施者责任的国内法院和司法程序对于执行补充原则至关重要。通过履行这一责任，缔约国支持法院根据补充原则，聚焦于调查和起诉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在法院去年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现在要展望它的下一个篇章。我们认可它的许多成就和功绩，但仍存在一些挑战。新西兰欢迎法院和缔约国共同探索旨在加强法院和提高其执行任务绩效的改革前景。所有潜在的改革都应使法院具备

能力，并增强其权能，以最佳方式实现问责和适当监督。

法院通过其司法职能及裁决的质量和本质，对国际刑事司法和判例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法院的核心职能，我们敦促所有缔约国加强和维护这一职能，包括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法院法官拥有发挥作用的最好条件。新西兰期待在即将召开的缔约国大会准备工作和会议期间，就这一问题和其他改革问题与其他缔约国和民间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

鉴于法院和缔约国在确保对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追究责任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新西兰致力于继续开展公开、诚实、尊重并注重国际社会共同目标的对话。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其任务和信誉的基础，新西兰敦促所有国家维护这些原则，并在与法院打交道时遵循这些原则。最重要的是，我们坚守对法院的承诺，并将与其他各国合作，确保法院仍然是并被视为一个有效和可持续的司法机构。

邦久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乌克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早些时候的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首先，我谨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全面介绍法院这一年的活动。

我们欢迎法院采取步骤改进工作，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并通过2019至2021年全法院战略计划。我们赞赏地注意到，继法院去年开始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后，已经有几个缔约国批准或接受了关于该罪行的修正案。从正在进行的调查到司法活动，法院所有活动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各国的合作。提供这种合作是对预防最严重罪行和打击这些罪行不受惩罚现象的重要贡献。

作为首批支持建立基于条约的常设国际法庭的国家之一，乌克兰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刑院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于2000年签署了《罗马规约》。后来，乌克兰也成为了首批批准《国际刑院特权和

豁免协定》的非缔约国之一。乌克兰政府对本终审法院抱有坚定信念，于2014年4月17日根据《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三款提出声明，接受国际刑院对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2月22日期间在其境内所犯罪行的管辖权。此外，2015年9月8日，乌克兰政府根据《规约》同一条款提出了第二项声明，接受国际刑院对2014年2月20日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发动军事侵略开始在其境内犯下的罪行行使管辖权。我应该重申，这些声明是无限期的。因此，国际刑院将能够对这种罪行行使管辖权，不论犯罪者是什么国籍，即使是第三国公民。

我们赞赏检察官办公室在报告所述期间重点分析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发生的罪行，以便确定可能需要调查的案件。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及外国非政府组织继续向法院提交更多资料，并通过法院协商和在法院访问乌克兰期间（最近一次是在6月）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进行初步审查。特别是，乌克兰执法机构与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合作，不断记录并向法院提供补充信息、事实和证据，证明目前乌克兰境内武装冲突的性质是外国武装侵略造成的国际武装冲突，并证明侵略国武装部队及其占领当局、人员和代理人在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上犯下的诸多战争罪。我们赞赏检察官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并期待国际刑院关于2019年初步审查活动的报告。

乌克兰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地要求伸张正义，特别是要求起诉并追究所有在乌克兰犯下严重罪行者的责任。在这方面，乌克兰重申全心全意地支持国际刑院。最后，我要强调，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与为所有人实现和平与安全直接相关。

布莱斯女士（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加拿大长期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并支持其努力追究最严重国际罪行责任人的责任。确保对此类罪行追责有助于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这与尊重法治密不可分。我们对缅甸境内的有罪不罚现象感到尤为关切。因此，我们欣见法院正在审查对罗兴亚人民犯下危害人类罪的指控。然而，我们认识到法

院不得超出其管辖范围所带来的固有限制。因此，加拿大继续呼吁安全理事会将缅甸局势移交给国际刑院。移交该局势将确保法院有权调查针对罗兴亚人民犯下的所有暴行罪。

正如法院在其报告（见A/74/324）中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向法院移交局势的公认特权可以促进在可能发生了严重罪行但法院缺乏管辖权的国家适用责任原则。法院还指出，法院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结构性对话可以改善安理会移交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加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这种讨论也有助于确保国际刑院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处理安理会移交它的案件。因此，加拿大支持与安全理事会开展结构性对话。

考虑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法院，加拿大也欢迎目前关于寻找加强法院的可能办法的讨论。我们尤其欢迎主席团为此目的召集缔约国的努力。虽然讨论的领域很多，但加拿大支持努力在法院内部扩大多样性并改善性别平衡，确保用强有力的国家甄选程序为法院内部选举职位甄选候选人，并以最佳方式分配资源，以便法院能够履行其使命。因此，加拿大期待在12月的缔约国大会上与其他缔约国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互动。

我必须简要重申我们的信念，即普遍批准《罗马规约》对法院的成功至关重要。由于事实证明其他论坛在确保对实施暴行罪追责方面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我们应继续优先推动普遍加入《罗马规约》。同法院一样，我们非常赞赏民间社会促进普遍加入《规约》的努力。但是，所有缔约国也有义务定期向非缔约国提出该问题，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有罪不罚的斗争中有着重要作用。

国际合作对于国际刑院的成功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加拿大与刑院一样，对逮捕和移交15名个人的请求仍未得到执行表示严重关切。只有所有缔约国响应逮捕令并协助当前的调查，刑院的工作才能取得成功。为此，加拿大欣见，去年刑院就指称的2013年和2014年中非共和国境内发生的战争罪与

危害人类罪发出的两项新逮捕令得到迅速执行，并且这些个人被移交刑院羁押。我们对缔约国当前在调查工作中的合作情形表示欢迎。只有一道努力，我们才能追究严重国际罪行制造者的责任。

最后，我谨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大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期待继续讨论如何努力加强国际刑院的工作。

皮埃罗·里韦罗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见A/74/324），并表示坚决致力于打击对影响国际社会的罪行不予惩罚的现象。

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过去几年的事态清楚表明，需要一个独立的国际司法机构，能够领导这场打击不惩治严重犯罪现象的斗争。但是，我们认为，《罗马规约》第16条赋予安全理事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工作的广泛权力没有专门将其界定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不仅扭曲了刑院管辖权的实质，而且也违反了司法机构独立性和司法过程中透明与公正的根本原则。安理会向刑院移交案件确认了我国已频繁指出的这种消极趋势。安全理事会的移交程序继续违反国际法，以所谓打击有罪不罚的名义来攻击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古巴重申其立场，即：设立一个公允、非选择性、有效并且公正的国际性刑事法院，该法院补充国家司法系统，真正具有独立性，因而不受可玷污其实质的政治利益的左右。

古巴强调，国际刑事法院不能无视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法的原则。它必须遵循这样的法律原则，即：一国必须同意才能受到某条约的约束，这在1969年5月23日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1条中得到认可。我们愿重申，根据《规约》第12条，我们对刑院创下先例，决定对未接受刑院管辖的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民启动司法程序表示严重关切。国际刑院的管辖权必须保持其独立性，不受联合国政治机构的影响，并且必须始终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相

辅相成。《罗马规约》不是为了替代国家法院而订立的。

根据《关系协定》，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向大会报告其活动。虽然古巴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一员，但是它愿意继续积极参与与之有关的谈判进程，特别是大会每年通过的关于法院报告的决议，目前大会面前就摆着决议草案A/74/L.8。但是，我们再次对企图违反《关系协定》的做法、特别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同安全理事会的关系方面表示关切。我们应指出，文件A/74/324所载的报告提出，必须建立这两个机构间的对话，我们认为，这超出了《关系协定》中的授权。

近60年来，古巴人民深受一些前所未有的侵略行为的危害。骚扰和敌对已导致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伤亡。数以百计的家庭失去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时还遭受物质、经济以及金融上的巨大损失。然而，罗马规约坎帕拉审查会议对侵略罪的定义却没有考虑这其中的一些因素。侵略罪必须进行广义的界定，涵盖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出的各种形式的侵略，它不应仅限于使用武力，而且还应包括影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的各种行为。

最后，古巴重申，它愿意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刑事司法，奉行透明、独立以及公正的原则，并且不加阻碍地适用和充分遵守国际法。

刘洋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感谢奥苏吉院长就国际刑事法院年度工作所做报告（见A/74/324）。中国注意到，法院继续在调查、审判及补偿受害者等方面做出努力，同时，国际社会对法院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担忧也在上升。主要原因包括五项。一是，一些缔约国的重要关切在法院框架下未得到有效回应；二是，法院对官员豁免规则的处理引发争议，不少国家认为有必要由联大提请国际法院就此发表咨询意见；三是，法院预审分庭不当扩大管辖权，甚至模糊了非缔约国和缔约国的界线。四

是，对于是否授权检察官调查一项情势，法院似乎并无明确和统一的条件与标准；五是，个别法官在仍然参与案件审理情况下，接受本国政府大使职务任命，引发广泛质疑，这一问题后来虽然得到纠正，但是对于一个视独立和公正为其立身之本的国际司法机构而言，原本就不应该发生。

中方还注意到，法院上诉分庭今年五月关于约旦上诉案的裁决引发各方重大关切。该裁决依据相关临时国际刑庭的实践，认定国家元首在国际司法机构不享有豁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然而，法院并没有详细甄别这些国际刑庭实践的特定背景和条件。例如，相关刑庭规约在关于国家元首豁免方面有明确的规定，或者相关安理会决议载明类似规定，等等。从各国实践看，绝大多数国家一直明确主张，国家元首等高级官员享有无例外的豁免。同时，法院预审分庭和上诉分庭就相关事项多次作出裁决，但每次裁决的理由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这大大削弱了法院的权威与公信力。

中方认为，法院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改进不足，以回应国际社会对上述方方面面的合理担忧和关注。中方希望，法院严格按照《罗马规约》审慎行使职权，确保其司法活动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内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实现公平正义。

Jiménez Piernas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能再次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大会发言，让我深感荣幸。加强国际刑事法院是西班牙的优先事项。法院的工作是，调查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罪行，并以终审法院的身份行使管辖权，作为对国家管辖权的补充，以期结束有罪不罚现象，防止此类罪行，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首先，我谨指出，西班牙赞同早些时候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要赞扬法院持续开展工作，因为它一直在运作。法院目前有11个未决案件和11个处于初步阶段的其他案件。一些案件处于上诉阶段，

一些案件正在等待判决，一些案件基本上已经结案，一些案件刚刚开始审理。所有这些工作都在艾博伊-奥苏吉院长提交的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报告（见A/74/324）中得到反映。我们真诚地感谢他、各位法官、本苏达检察官及法院所有工作人员。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在近代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自《罗马规约》20多年前通过以来，各国一直在其首都并通过参加缔约国大会的各种工作组、委员会和会议，处理法院的各项工作。各国之所以关注这一问题，是因为法院职责极为重要，工作具有政治性，而且其预算由缔约国财政负担。

法院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启动一个由独立专家开展的技术审查进程，以期改善法院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业绩、效率和效力，特别是法院的治理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他们的报告将于2020年9月提交缔约国大会第十九届会议审议，届时选举新法官和检察官的进程差不多也将完成。还必须强调与缔约国合作、保护受害者以及选举官员担任高级职务等问题。我现在就谈谈这些问题。

法院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坚定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西班牙——尽管它们也在知情的情况下提出了批评，这是事实。但是今天，法院面临一系列挑战，有的由来已久，有的才出现，还有一些反复出现，致使法院难以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我们感到痛心的是，法院在努力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障碍和困难，特别是有人威胁对我们选出的代表国际社会起诉此类罪行的人——即检察官——实施报复。这些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其目的是限制她的调查自由。许多国家在大会继续重申坚决支持法院，认为法院是发展世界司法体系治理机构的一个关键工具。虽然法院尚不是一个普遍性组织，但它渴望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其缔约国和民间社会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同时，保护法院，使它能够得到所需的一切资源，

在不受第三方不当干预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应成为我们的主要目标。

成为法院的缔约国当然意味着参与法院及其实体的各项安排。然而，多年来，我们看到，某些国家拒绝与法院合作，包括在法院应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身份提出的要求而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纠正任何时候出现的这种不合作情况，并确保它今后不再重演。因此，我们欢迎上诉分庭最近就某个缔约国不与法院合作一事作出裁决，因为这项裁决加强了法院相对于各国的地位，尤其是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已将有关案件移交法院。

不与法院合作的现象仍然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但这也是一个展现我们对法院的支持以及对其工作所作承诺的机会。过去几年与刑院缔结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其主要目的是发展最初在《罗马规约》中未做规定，但事实证明对确保法院良好运作至关重要的能力。西班牙目前正在与刑院谈判缔结两项合作协议，一项是新的司法合作协议，它将鼓励西班牙司法机关与刑院之间建立平稳和有效关系，另一项是关于执行判决的协议，这是刑院与缔约国之间通常缔结的协定的一部分。

我必须提及刑院所审理罪行的受害者，否则我将失职。刑院的判例证明了它的公正性。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或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但是，可以理解的是，作为尊重各方权利保障制度的结果，无罪释放令受害者感到沮丧。至关重要的是应通过促进由法院预算承担免费法律援助的做法，帮助受害者并改善他们的处境，同时不应忘记法院受害者信托基金发挥的重要作用，西班牙根据我们的财政能力定期向该基金捐款。基金根据其提供援助的任务授权，通过在被告无力支付的案件中支付法院判决规定的赔偿，帮助了40多万名受害者。基金的自愿捐款对

确保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和《罗马规约》所创建系统的有效性来说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提及选举将在今后几年担任法院最高职位者这一历来微妙的问题。我要特别提到检察官和法官的职位，但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职位。新的选举周期即将到来，至关重要的是应确保首要标准是寻找和评估公认具备熟练专业能力的候选人。当选者未来几年要做的工作需要候选人具有该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有保证的技术专长，这比其它标准更重要。这是确保法院各项任务今后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自1945年以来不断建设的复杂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目的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有责任不仅维护这一遗产，还应通过我们的行动来改善它。让我们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加强刑院，例如即将举行的法官和检察官选举，同时不忽视其任务授权在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阿祖纳夫人（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院长的报告（见A/74/324）。菲律宾不赞成决议草案A/74/L.8。

菲律宾退出《罗马规约》于3月17日生效。我们退出的决定是菲律宾反对那些把人权政治化并无

视我国独立和行之有效机关和机构者的原则立场的一部分，这些机关和机构继续对由于我们努力保护人民而产生的指控行使管辖权。像所有民主国家一样，正义的车轮有时转动缓慢，但它们确实在转动。法治不能也不应为求立即惩处而受损害。尽管我们退出了《罗马规约》，但菲律宾申明，我们致力于打击对暴行罪的有罪不罚现象。我们有惩罚这种罪行的国家立法。实际上，今年我们纪念《菲律宾打击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灭绝种族罪及其他危害人类罪法》十周年。

许多人很容易忘记，《罗马规约》的基础是补充性原则，而不是替代原则。《规约》承认，各国负有起诉国际罪行的首要责任和权利，国际刑事法院只有在国家法律制度失灵或无法起诉此类罪行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管辖权。我们有能力也愿意起诉罪行。我们从未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把国际刑事法院视作国家法院的替代品。今年早些时候，毛特恐怖组织的一名成员因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被法院定罪，这表明菲律宾有效执行了其国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下午1时散会。